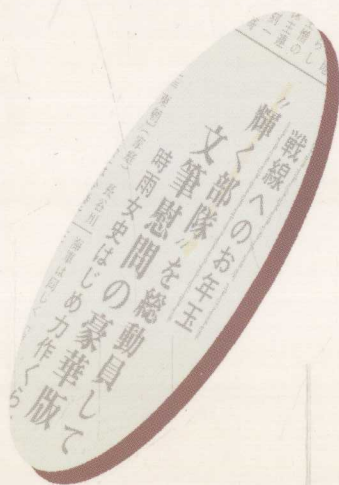


昭和史の証言——戦時体制下の日本文学（1931-1945）

胡连成 著

昭和史的证言

——战时体制下的日本文学
(1931-1945)



吉林大学出版社
JILIN UNIVERSITY PRESS

本书承蒙日本住友财团资助出版

本书在搜集资料、撰写及出版时得到了日本住友财团的资助，在此深表谢意。

本書資料蒐集、執筆及び刊行にあたっては、日本国財団法人住友財団の助成を受けました。謹んで感謝したい。

本书承蒙日本住友财团资助出版

昭和史の証言——戦時体制下の日本文学（1931-1945）

昭和史的证言

——战时体制下的日本文学

（1931-1945）

胡连成 ◆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JILI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昭和史的证言：战时体制下的日本文学/ 胡连成著.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5

ISBN 978 - 7 - 5601 - 4505 - 1

I. 昭… II. 胡… III. 现代文学—文学史—日本

IV. I313.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4160 号

书 名：昭和史的证言——战时体制下的日本文学
作 者：胡连成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刘冠宏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8.125 字数：220 千字
ISBN 978 - 7 - 5601 - 4505 - 1

封面设计：孙 群
长春大学印刷厂 印刷
2009 年 5 月 第 1 版
2009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定价：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 址：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编：130021
发行部电话：0431 - 88499826
网 址：<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序

在历史事实中阐释历史

(日) 岛村辉*

就在美利坚合众国次贷证券信用下跌导致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2008年10月,日本航空自卫队最高长官——航空幕僚长田母神俊雄撰写的论文获得了民间企业举办的悬赏论文的最优秀奖,这一事件曝光之后,舆论大哗。该论文的内容是,将日本在伪满洲国、朝鲜半岛实行的殖民统治正当化,并对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的现行宪法提出质疑。关于日中战争,该论文认为,“中国政府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其实是蒋介石把日本拖进了这场战争,日本才是受害者。”关于伪满洲国、朝鲜半岛,该论文认为,正是由于日本的殖民统治,“当地人民才得以从暴政中解放出来,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

* Professor Teru Shimamura, 1957 年生于日本东京,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东京大学研究生院人文科学研究科。现为菲莉斯女学院大学(Ferris University)教授,是研究日本近代文学、日本无产阶级文学、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的著名学者。曾任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日方派遣专家,担任过小林多喜二《蟹工船》随笔大赛评委会主席。在2008年9月召开的英国牛津大学“2008年牛津大学小林多喜二研讨会”上,担任共同协调人。主要著作有:《临界的近代日本文学》(1999年)、《〈心灵笔记〉的语言和诡计》(2005年)等。

日本政府于1995年发表了村山富市内阁总理大臣的谈话，指出由于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痛苦”，承认了战争责任，历代内阁领导人也都遵循这个谈话精神。这起事件发生后，麻生首相表示将继续遵循村山谈话精神，而武装部队的首脑人物以应征悬赏论文这一形式发表了明显有悖于政府立场的见解，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于是，田母神俊雄被立即撤换。正是由于这起事件，将近100名自卫队员应征悬赏论文，以及自卫队内部一直在进行美化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的教育等事实，也相继曝光，为世人所知。

在日本，从二十世纪末到本世纪，对亚洲太平洋十五年战争等历史进行清算的战后历史观经历了巨大的考验。在美利坚合众国世界性军事战略之下，为打开一条同盟国日本实质性参加由美国主导的战争之路，美国方面不断对日本施加压力，迫使日本修改宪法。小泉内阁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且以邮政民营化为其唯一的政治课题在众议院获得了绝对支持。继之而来的成立于2006年的安倍内阁，则强行修改《教育基本法》，为修改宪法而进行了诸多准备活动。在民间，“新历史教科书编写会”编写的扶桑社版教科书通过了文部科学省的检定，该会还为2005年度学校采用此书展开了强大的舆论攻势。在这种背景下，一股否定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实行殖民统治和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策动将自卫队宣示为“军队”的论调甚嚣尘上。

面对这种事态，以中国、韩国为首的亚洲和世界各国及各地区发出了谴责和忧虑之声。日本国内于2004年成立了“九条会”，该会由9名足以代表日本的著名人物组成，共同捍卫《日本国宪法》第九条之和平条款，全国各地迅速响应，草根阶层的“九条会”不断扩大。尽管《教育基本法》被强行修改，但2005年采用教科书时，只有极少数学校采用了扶桑社版教科书。更为重要的是，2007年参议院选举时，以“修改宪法”为首项选举公约的自由民主党惨

遭失败，安倍总理大臣被迫下台。现在，要求“修改宪法九条”的舆论已经成为少数意见，要求以宪法明文宣示军队之存在的动向亦在表面上略归沉寂。但是，本文在开头部分指出的对于历史的扭曲认识以及对于战争的拒绝反省，仍然顽固地存在于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一有风吹草动，便阴魂出窍，大行其道。这次撤换幕僚长之时，执政党自由民主党之中，就有不少人赞同该论文的主张，而大多数国会议员一齐参拜靖国神社这一状况基本上并没有多大改变。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可以说，日本政府对于历史认识的态度，尚不容丝毫乐观。

在这种情况下，胡连成先生《昭和史的证言——战时体制下的日本文学（1931—1945）》一书，作为曾经遭受日本侵略之当事国的日本近代文学研究者撰写的亚洲太平洋战争期间的日本文学的学术成果，将对出版国中国以及日本、韩国等亚洲各地的日本文学、日本文化、日本历史的研究，作出积极贡献。

本书把日本发动的亚洲太平洋十五年战争分为九一八事变至日中全面战争爆发、日中全面战争爆发之后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到日本战败这三个时期，对于各个时期的日本文学状况，基于历史的大视野进行了分析、阐述。在分析所谓“战时体制”之特色的同时，兼论战争结束之后的战争责任、战后责任问题，并基于遭受战争侵害一方的历史认识而非遂行战争一方的历史认识，来阐释这一全面的“文学现象”。

就像本书已经指出的那样，迄今为止，对于亚洲太平洋十五年战争期间的文学史阐述，已发表了诸多研究成果，但这是历史上产生了此类文学的日本方面的研究成果，而且由于诸多制约，很难说已经讨论得十分彻底。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说，在质和量上，还显得十分不够。我们相信，胡连成先生的这一力作出现，必将拉开外国学者对于战时体制下的日本文学之学术研究的序幕。可以预见的是，胡连成先生基于“综合记

述和个别实证”这一远近法而进行的这项研究工作，必将结出丰硕果实。

我们经常会感到，对于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等事实，即使是那些努力接近历史真相的人，属于侵略一方的国家的人和属于被侵略一方的国家和地区的人之间，在总体认识上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有时甚至会出现动摇研究者主体意识的“拒斥”之感。对于这种总体认识和相互之间语境上的差异，我们只有发挥充分的自省精神，才有可能以上述差异为前提进行充分的观点交锋，而在此接受考验的，将是直面这种“拒斥”之感的勇气以及共享同一学术园地而又能够毫不妥协地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的同行之间的信赖。

笔者和作者胡连成先生之间，迄今为止已在国际学术会议的会场及会后举行的联欢会上有过数次交往。每一次交换意见的内容及其对历史认识的真诚态度，率真而又亲和的性格，都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他要出版新著，嘱我作序，这对于笔者来说，实属荣幸之至。笔者对胡连成先生的辛勤劳动表示慰问，衷心地祝愿他不断进步。并借此机会，热切期望以本书为契机，一个紧密联系现代世界形势的学术对话能够扩展到日中两国乃至亚洲各国的日本近代文学、文化、历史学者之间；热切期望这种学术对话能够促使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及各地区之间的军备竞赛主张在事实上归于无效。

岛村辉

2008年12月8日

目 录

序	1
绪论 1 关于战争责任的极少数与绝大多数问题	1
绪论 2 本课题的研究现状和选题意义	9
第一章 非常时期、准战时体制、战时体制与日本文学	15
第一节 非常时期、准战时体制、战时体制及其核心意识形态： 军国主义	15
一、关于非常时期、准战时体制、战时体制的 分期问题	16
二、关于军国主义	20
第二节 日本军国主义对国民的思想控制不断加强	23
第二章 九一八事变后的日本文学状况（1931—1937）	31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与日本文学	31
第二节 非常时期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40
第三节 昭和八年：“转向的季节”的来临	45
第四节 “反动的收获期” ——另一种“文艺复兴”	62
第三章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的文学状况 （1937—1941）	70
第一节 战时体制与日本文学	70
第二节 战争文学的“赫赫战果”	76

一、战争文学第一篇：榊山润的《战场》	76
二、“战地报告文学”第一篇：林房雄的 《上海战线》	79
第三节 战时文坛的倒霉蛋和幸运儿 ——石川达三与火野苇平的场合	83
一、倒霉蛋石川达三及其《活着的士兵》	83
二、幸运儿火野苇平及其《麦子与士兵》	91
第四节 笔杆子部队	98
一、文坛霸主菊池宽	98
二、“笔杆子部队”的“辉煌战果”	104
第五节 争先恐后 ——御用文学团体纷纷成立	116
第六节 战争期间的丑陋表演 ——狂热的诗人们	132
一、反战诗人与天皇制国家权力的不对称较量	132
二、御用诗人作为侵略战争大唱赞歌	138
第四章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的文学状况 (1941—1945)	152
第一节 文学家的12月8日	155
第二节 “文坛的解消” ——日本文学报国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164
第三节 战时文学的越境 ——3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召开	170
第四节 军国末日 ——文学的非文学状况	179
第五章 文学家的战争责任与战后责任	206
第一节 文学家的战争责任	206
第二节 文学家的战后责任	221

目 录

结 语 历史记忆的选择性失忆	234
参考文献	239
后 记	248

绪论 1

关于战争责任的极少数与绝大多数问题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领土上的暴行，已被学者们千百次地研究与叙述，人们并不陌生。而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我们则习惯于说，是极少数军国主义者发动了这场战争，绝大多数日本人民是无辜的或者是被迫的。许久以来，对于这些看似常识性的说法，我经常 would 问自己：发动一场空前的世界规模的侵略战争，仅凭极少数军国主义者分子就能够发动得了吗？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抑或社会基础，没有全国各行各业的国民的大力支持^①，很难想象包括陆军省、海军省（二者为政府部门）、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二者为军令部门，不受政府辖制，直接向天皇负责）在内的日本军部以及当时的内阁能够发动这场战争。

诚然，有人可以说，当时各行各业的日本国民之所以大力支持侵略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进行欺骗宣传、胁迫、利诱的结果，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但还不够充分。资料证明，当时的很多日本

^①举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据日本学者藤井忠俊研究，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国民的反应首先表现为去神社祈祷、到军队驻地慰问、开展国防募捐等，并出现了所谓“募捐现象”。开始是“慰问募捐”，继而发展到“飞机募捐”，很快发展成一种名为“国防募捐”的全国性“募捐热”。见藤井忠俊「国防婦人会——日の丸とカップウ着」8～10页，东京，岩波书店，1985年4月。

国民对于侵略战争的狂热^①，对于侵略战争胜利之后可能获得的权利、利益的热烈期待，也是不能否认的。正是这种狂热，这种期待，再加上日本人特有的那种盲从的国民性^②，才使得这场战争愈演愈烈，战线不断延长，使得日本军国主义深陷泥潭之中，并最终导致日本军国主义的覆亡。

长期以来，绝大多数中国人习惯于认为：是极少数军国主义者发动了这场战争，广大中国人民是受害者，绝大多数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他们是被迫的或者是无辜的。这种认识不是一天、二天形成的，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其历史原因的。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主要领导人，在当时复杂多变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下，本着中日和平友好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

①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中，日本女性是温柔和顺从的，残酷的战争似乎离她们很远。在战争期间，她们中的很多人，失去了父亲、兄弟、丈夫，这令她们悲痛欲绝。因此，人们本着善良的愿望说日本女性是这场战争的最大受害者，是值得深切同情的。但人们似乎忘记了或不愿意提起她们在战争期间的另一面，我们只要看一看日本妇女在战时体制下自主创建、运作而风行一时的“国防妇人会”（最多时达到1000万人），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对于60多年前那场侵略战争，尽管程度不同，日本妇女是有很大责任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国防妇人会”在日本法西斯的形成过程中，是唯一一个来自于民间的、具有广泛民众性的、并获得了最多会员的民间组织，是日本民众积极参与侵略战争的一个典型事例。“国防妇人会”的经常性活动是：欢迎和接送出征、回国的军人；欢迎和接送参军、退伍的士兵；慰问伤病员；缝制慰问袋；参加防空演习；开展短缺国防资源的回收运动；风灾、水灾救助；缝制被服等。见藤井忠俊『国防婦人会——日の丸とカッポウ着』86～87页，东京，岩波书店，1985年4月。

②有学者指出，日本近代以来长期不断的对外侵略战争，在国内确实得到了广泛的社会支持。特别是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作为民主与和平基础的普通民众及一些进步力量也转而支持天皇制国家的侵略行为。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宣传小国的生存忧患，使扩张、扩大生存空间成为普遍的社会意识；源于天皇神裔论的天皇崇拜和源于武士道的忠诚意识，使日本国民对是非的判断和反思水平受到极大限制；日本近代推行军国主义教育对民众的欺骗和毒化等等（参见陈树涵论文“试析日本国民中存在盲从战争思想的原因”，《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2期）。应该说，这种见解是较有说服力的。关于日本人的国民性，关于武士道与忠诚，关于日本人与战争的关系，请参阅（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等译《菊与刀》（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6月）、（日）新渡户稻造著、张俊彦译《武士道》（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2月）等书。

的力量这一基本精神，一直是坚持这种历史认识的。而这种历史认识，通过教科书、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媒体，广泛地影响了绝大多数中国人。

中国人民是善良的，中国政府是宽大的。对于日本的战争责任，在战争期间与战争结束之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过程。

当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是极为愤慨和坚决抵抗的；对于抗战的前途，又是非常忧虑的。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共中央在“卢沟桥事变的第二日，七月八日，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宣言中说：‘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抵抗，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华北，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抵抗日寇的侵略！……驱逐日寇出中国！’”

当时，国民政府的反应也很强烈。卢沟桥事变10天之后的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声明：“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①

但是到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随即发表了广播讲话，他引用《圣经》上的“宝训”，要求“全国军民同胞们”，对待日本要按照“待人如己”与“要爱敌人”这两句话的要求去做。对于日本的战争责任，他指出，只有穷兵黩武的日本军阀负有责任，而广大日本人民是无辜的，是被愚弄的，是被迫的。蒋介石说：

“我们中国同胞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

^①全文见“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总第343~3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文中引用了中共中央7月8日发表的抗战宣言、蒋介石7月17日发表的庐山谈话。文章提出了抵抗日本侵略的两种方针、两套办法、两个前途，主张一定要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争取第一个前途。

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黠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企图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侮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此前的暴行，以侮辱来答复他们此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军民同胞今天所应该特别注意的。”^①

蒋介石这番讲话，实际上为日本军国主义及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定下了一个基调。这个基调，直到国民党在3年内战中败北，退守台湾一隅，没有什么变化。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于日本彻底战败，美苏两大阵营对峙及冷战的开始，远东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对美国占领之下的日本的态度，已经与战争期间有了很大的不同，对日宽大与同情的成分多起来了，对日统一战线的成分多起来了。对日本的战争责任，再三表明了我国的基本态度。这些对日问题的表态，大都是以接见日本来宾时的谈话这一方式表达出来的，而这些谈话经过报刊、广播等新闻媒体的传播，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1954年10月11日，周恩来总理在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和日本学术文化访华团的谈话中，再三向来访的日本客人保证，中国不会威胁日本的安全，指出“这不是我们的一般政策，而是基本政策。”周恩来还说，即使“我们工业化了，日本也工业化了”，中日双方也不会经济问题上发生冲突。

在这次谈话过程中，周恩来没有提到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长达15年的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而是一笔带过地说“……

^①见“蒋介石对日本投降的广播词”（1945年8月15日），张蓬舟主编《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1932—1982）》第五卷，341～342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

这已经过去，我们应该让它过去。历史不要再重演。”^①

1956年6月28日，周恩来在同日本国营铁道工会等访华团谈话中，提到了对于正在中国关押的1000多名日本战犯的处理办法：大部分遣送回国，只从轻判处45人，“我们对这些战犯没有判死刑和无期徒刑的，刑期最长的只有二十年。”周恩来希望通过这一处理办法，“把这些不愉快的事情结束了”。

这篇谈话没有提到日本战犯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行，而是称这段历史是“不愉快的”历史^②。

1961年2月28日，周恩来在同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会长山本熊一率领的日本经济友好访华代表团谈话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如何看待日本侵略的问题。他指出：“山本先生说了一些告罪的话，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不必再提，双方都应该向前看，中日两国人民要永远地友好下去。不错，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中国人民造成了灾难，同时也给日本人民造成了灾难。”“过去军国主义给亚洲人民造成灾难，给中国人民造成灾难，也给日本人民造成灾难。”

周恩来在谈话中，还提出了一个假设，如果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将会引起五个方面的矛盾，而这些矛盾是不可解决的。其中之一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之间的矛盾。日本广大人民是要求和平的，不愿意再遭受战争灾难，不愿意再走战争的危險道路。因此，军国主义者要从战争中寻找出路，必然会引起日本人民的反对。”^③

①谈话全文见“中日关系的关键是和平共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87~9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另，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年表（1945—1993）》（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8月）1954年10月11日项下，有周恩来指出“中日两国人民加强友好往来，就能阻止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危險”一句，但通读讲话全文，周恩来并未说过这样的话，亦未说过类似的话。这篇谈话给人的总的印象是，周恩来在日本客人面前表现得相当自信，对新中国的外交现状和前景相当乐观。

②谈话全文见“中日两国人民要多多往来，为两国关系正常化铺平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168~17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

③谈话全文见“中日双方都应该向前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303~30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

1972年9月25日，周恩来在欢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宴会上发表祝酒词，在这篇讲话的第4天（9月29日），周恩来总理和田中角荣首相签署中日联合声明，中日两国正式建交。距近代中日两国第一次建立外交关系的1871年7月29日^①这个时间是101年零2个月。

周恩来在这次讲话中，谴责并批判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他指出：“自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中国人民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严格区分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的日本人民。”^②

周恩来的上述讲话，清楚地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待那场侵略战争的基本看法：侵略战争只是一小撮军国主义者挑起和发动的，绝大多数日本人民是反对侵略战争的；与中国人民一样，日本人民同样是那场侵略战争的受害者。

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在同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的谈话中，谈到了如何看待日本战败及战争责任的问题，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于日本的战争责任的基本态度。毛泽东指出：“过去的战争应由垄断资本、军国主义政府负责，而不应由日本人民负责。”对于这场战争，毛泽东认为：“事实上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

^①1871年7月29日，李鸿章和伊达宗城全权大臣在天津签署《中日修好条规》，两国正式建交；1873年4月，副岛种臣抵天津，中日双方互换了条约批准书。

^②祝酒词全文见“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代友好下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494～49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

威胁、欺骗、强迫日本人民去当炮灰的。”^①

应该说，这个看法在战略把握上是正确的。我们知道，一场规模巨大的侵略战争，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发动不起来的。这个群众基础，就是各种民间、半民间团体和组织，以及在“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威胁、欺骗、强迫”之下被迫参加这些民间、半民间团体和组织的“日本人民”。只是我们知道，还有很多“日本人民”并不是受到“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威胁、欺骗、强迫”之后才心甘情愿“去当炮灰的”，而是积极支持这场侵略战争的。

研究表明，这样的“日本人民”即使不是绝大多数，也决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极少数。这在研究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国民基础时，是一个经常被忽略然而又是必须关注和正视的问题。

日本学者藤井忠俊在《国防妇人会》一书中，对日本妇女在战时体制下的一系列活动及其历史作用，进行了实证性研究。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历来很少，胡澎博士在其《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1931—1945）》一书中，涉及了这个问题。她还在理论上深入地分析了战时军国主义女性教育体制及武士道精神对战时日本妇女的毒化以及近代天皇制传统对战时妇女的影响等^②，从一个侧面指

^①谈话全文见“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八卷，241～2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另，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提到了他以前与南乡三郎的谈话，发表了那个容易引起误解的“感谢论”。谈话是这样的：“日本的南乡三郎见我时，一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么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就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其实，以毛泽东一贯的哲学思考来看，他这段话的用意是明显的，是说反面意义上的感谢，是说日本军阀这个反面教材当得好，唤醒了中国人民。因为毛泽东一贯相信事物之间的互相转化，相信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反而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空前的民族主义情绪与爱国主义热情，从而将八年抗战坚持到最后胜利。

^②参见胡澎著《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1931—1945）》第六章，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